

汪道涵：

两岸牌局中的“千王之王”

汪道涵：两岸牌局中的千王之王在当代政治话语中，“汪辜会谈”已经成为两岸沟通的一个代码。大陆的汪道涵，台湾的辜振甫，此二人肩上担负的分别是大陆人的渴望和宝岛人的企盼。“汪辜会谈”的成果如何，直接关系到两岸人民的喜怒哀乐，利益得失，其意义必然是历史性的。

翻阅世界各地的报纸，随便在哪一天的版面上，也许你都会触及类似这样的标题：《美国国务院声明对汪辜会谈表示欢迎》

（法新社华盛顿 1998 年 10 月 9 日电），《调查显示台多数人赞成两岸政治会谈》（美联社香港 1998 年 10 月 7 日电），《日报说辜振甫将巧妙利用京剧交流》（日本《产经新闻》1998 年 10 月 10 日报道），《台媒体盼汪辜会晤有利保障台商利益》（中央社高雄 1998 年 10 月 10 日电），《辜振甫抛出创意风向球》（《中央日报》1999 年 10 月 16 日评论），……。多年以来，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已经成为媒体上一个极为敏感的名字。汪道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不是 1996 年 7 月初，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雷克的一次大陆之行，人们对这个问题也许仍然不会深究。

美国总统安全顾问访华时要拜见的人

1996年7月初，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雷克在访华行程中，特意安排了一项赴上海会见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的内容。当这一消息由美国白宫发言人宣布之后，台湾朝野极为震惊。台湾方面认为，雷克的这一行动无疑是对台湾的出卖。须知，海协会只不过是便于海峡两岸有个初级的沟通渠道而建立的，没有太大的理由与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举行平等的会谈，美国方面如此抬举海协会，台湾方面自然感到屈辱和不平。也正由此，才引起人们对汪道涵本身的兴趣：难道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汪道涵何许人？他与中国政权关系如何？一时间，海外报纸沸沸扬扬，各种说法纷至沓来。香港方面有消息说，汪道涵其实就是中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与雷克扮演着相同的角色，是在中共内部掌握实权的人。美国方面的反华媒体更是多方挖掘信息，妄加评说，他们虽不敢否认知识分子出身的汪道涵的才识和能力，也不敢忽略曾长期主持过外经、外贸工作的功绩，却还是恶意指责，认为这是在取消干部终身制后，给他一个几乎可以“终身”问政并且可以长期公开露面的具体名份。海协会会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因为这是一架梯子，两岸的大人物必须有这架梯子才可能走到一起。不言而喻，其作用和历史意义是非凡的。

老革命甘心让贤当人梯

江泽民是江苏扬州人，因其祖籍是安徽，与汪道涵算是大同乡，所以，外电才有了一些子虚乌有的歪曲报道。

1985年，江泽民上海市长之职，是从汪道涵手中接任的。汪道涵不仅自己甘心让贤，而且还大力举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固然存在少数的贪官贪权的现象，但那些只是极个别的心术不正的人。大多数的党的领导都能做到让贤让位，做下一代的人梯。让我们举三个最有名的老人做例子，来做一个有力的证明。第一个例子就是刚刚讲过的汪道涵。第二个则是刘澜涛，他在任中国电力部部长时，首先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干部年轻化”的号召，甘心让位并大力举荐年轻的部下李鹏，这一壮举为共和国培养了一位年轻的总理。第三个是李一氓，他也是慧眼识英才，发现了自己部下乔石的为人端正，生活廉洁，以及精明能干，有着非凡的魄力和领导才华，于是也甘心让贤。

这三位老人的义举给“八九风波”之后动荡的共和国培养了第一、第二、第三把手，就连美国最挑剔的政治家，也说这三位老人是共和国的三大伯乐。

这些老革命们的甘心让贤当然不是只凭几年的工作关系及上级对下级的了解。了解一个人就要先了解他的历史，知人善任，这才是对党和人民负责任。外电在议论他们之间的关系时，都不能从这一角度入手，往往以偏盖全，是不能以理服人的。

谷牧招贤纳士

汪道涵曾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抗战开始后，在安徽省任职。五十年代初，大批华东系统干部被充实到北京政要部门，汪道涵被任命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文革结束后，我国一方面进行政治方面的整顿和改革，一方面着手抓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上，首先是搞改革开放，这就需要党的专家领导层亲自指挥并亲自上阵。所以，文革结束后，方毅被任命主持科技领导工作，而谷牧作为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全国对外开放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方毅是谷牧的得力干将，作为华东系统领导人出身的谷牧也曾经间接领导过汪道涵，对汪道涵也很赏识。这种赏识其实是很有根据的。建国后谷牧长期担任国家基建委、国家经委的领导工作，与一机部的负责人汪道涵自然有所接触，对汪道涵的能力和才干也是耳闻目睹的。

1979年7月，国家进出口管理局和外国投资管理局正式组建，谷牧亲自担任这两局的主任及党委书记，这是需要补充人力物力的时候，谷牧通过组织程序任用了汪道涵，让他做自己的副手——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

改革开放之初，一切都要非常谨慎地进行。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专门发出一份通知，其中规定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发展进出口贸易，技术引进、利用外资以及对外组织合作的方针政策。

制订全国进出口、技术引进、经济合作、外汇收支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协调有关方面的工作，检查督促计划的实施。组织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组织制订实施条例和有关管理办法。组织有关部门审批合资企业的协议、合同和章程。统筹管理各部门、各地方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和进口设备工作，审议中国和外国政府间的长期经济合作或长期经济贸易协定、协议等等。

通知中还要求：此两个委员会及其党组，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负责管理当时国务院的相关部级机构，包括外贸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海关总署、国家进口商品检验总局、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贸易促进会等，总而言之，所有与对外开放有关的事项，都由这两个委员会统揽。由此可见，谷牧领导的这两个管理委员会管理的范围之阔，任务之繁重。

任人唯贤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一贯作风。上面说的这两个委员会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极为重要的领导机构，自然需要招贤纳才。

戳一下台湾半个地球都发痒

对台政策是一个敏感问题，它一动就牵扯到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甚至中澳关系。

由于两岸交流的困难，双方政府往往存在着对基本政策的误解。曾经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台湾事务部部长的黄文放到台湾

进行私人访问时曾强调：中国大陆虽然由于对台工作人员的人事更替而引起许多误解，但大陆的对台政策是基本不变的，局部的小的调整也是为了更加有利于两岸统一，而台湾不应怀疑大陆稍有词不同便是要动武。

但说归说，台湾方面动不动就心怀芥蒂。新“八条”出台后，台湾方面就怀疑大陆是态度强硬了，要动武了，并由此而引起了不小的政坛骚乱。其实，这也正是汪道涵所期望的，目的是要警告一小部分“台独”分子，妄想分裂祖国是决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新的“八条”其实是非常宽容和友好的，但台湾方面负责大陆事务的官员智商却很低，他们不可能了解我党决策层的内幕，因此就出现猜测、琢磨、甚至主观臆断。据台湾方面的消息说，台湾的大陆事务官员常挨上司的骂，尽管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没有一次是让“头”满意的。

对此，台湾方面曾制造出许多谣言，中央社高雄方面曾传出议论，说中共的政权缺乏透明度，中共的官员都是根据个人的好恶去制定政策等等。其实很少理解，他们因为自己不理解大陆的特点而对我党横加指责，其实更加证明了他们缺乏起码的政治常识和政治宽容。

汪道涵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也正因此，中央才对他委以重任，并在台湾事务上认真听取他的意见。“美国之音”曾在 95 年下半年经常就“汪辜会谈”发表怪论，并声称某某观点是汪道涵的个人主张，与中央的意见并不一致等等。在新的“八条”出台之后，更是认定此乃汪道涵为使第三代领导核心标新立异而抛出的新政，干脆叫之为“江八条”，说这一切都是汪道涵在背后操纵所致。其实无论从哪看，“新八条”都比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等笼统的说法更为具体、详细，而且充满着政治

上的宽容和主动。最后一条被美联社的新闻称为“居高临下”的气势，并由此断定，第三代领导是比第二代领导更成熟、更自信的一代领导集体，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江八条”。

有一段路透社的消息是这样描述的：台湾方面若想在中共对台政策、特别是“动武底线”这样的关键问题上避免判断失误，最好的、最简单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随时注意汪道涵的谈话内容，或者是找机会直接从他的嘴里套出话来。这样不仅仅是因为汪道涵目前还担任着大陆海协会会长长的职位，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当代领导人在两岸关系走向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全世界的新闻机构都开始注意汪道涵个人，而非真正的“汪辜会谈”本身。这一切正是新闻机构的通病：挖新闻、找隐私、发怪论。这一切商业操作背后，真实的东西倒底又有多少呢？

汪道涵的助手唐树备在诠释“八条”及中共对台新政时，非常谨慎地用了一些官方话语，这一点与所有国家的新闻发言人没有什么区别。而汪道涵本身并非发言人的角色，他是大陆的海协会会长，所以，他在解释对台新政时就有着比较具体的内容，这也是他的权限所在。但是，这一点也被好奇的新闻传媒称作“代主发言”，是“帝师”行为，真让人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汪道涵取消台湾之行

本来，对台新政在 1995 年春节抛出之后，引起的效果是非常热烈的。在台湾的工商界、爱国人士中间，大家一致认可“新

政”的真诚和善意以及渴望两岸团聚的心情。一时间，受“新政”的鼓励，许多台湾工商界人士到大陆投资、观光，许多民间社团和爱国组织也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新政”的提议，并督促台湾当局立刻作出回应，推行两岸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李登辉政府开始紧张起来。他先是沉默，接着是跑到美国去求援，回来后又大唱反调，致使又一次两岸接近的机会给丧失掉。美联社对此也有些看不过了，他们讽刺李登辉甘愿给美国当棋子，而冷淡自己祖国亲人的呼唤。“看起来，李登辉政府比起江泽民的核心来，不知要弱多少倍。”美联社在当年的一则新闻里如此说。

为了表示对李登辉政府唱反调行为的厌恶，经中央研究，汪道涵取消了原已定好的台湾之行。并且，引发出了我军的导弹演习。

本来，那是一个绝对的良机。无论是对大陆还是对台湾。但由于李登辉政府的倒行逆使，使汪道涵取消了台湾之行。不仅如此，使可能使两岸关系正常化的、原定分别在北京和台湾举行的“汪辜会谈”成为了一句空话。

历史不会原谅罪人，中国人民也不会原谅李登辉政府的这一背弃民心之举。无论如何，历史和正义都不会忘记这样的事件，这样的日子。

在那样一段时间内，由于李登辉的不合作，导致了可能的两岸关系正常化又化为泡影。在此期间，《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了许多篇鲜明的文章，声明我党、我军的统一观点，并且警告台湾方面，如果一意孤行，将自食恶果。这些说法比《人民日报》上的还要强硬，以至于外界怀疑“江泽民、李鹏、汪道涵又在玩什么花招？”

这段时间，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日子。从张爱萍、叶飞到杨成武、洪学智，这么一大批老将军无一不对台湾政府的卖国

行为感到愤慨，他们有的撰文，有的集会发表演说，坚决反对李登辉政府的无耻态度，并旗帜鲜明地指出，李登辉就是“台独分子”，如果他不改变主张，将自食其果。

1995 年 8 月，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日子，张爱萍将军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在此之前，张爱萍将军曾发表过一篇怀旧文章和悼念李一氓的一首短诗。对待日本侵华战争，老将军自然有着无限的痛恨，那是一段永远抹不去的伤痛，所以，在此期间，张爱萍发表了许多署名文章，痛陈历史。就在悼念李一氓的那首短诗里，包含着对抗战历史的追述，和对战后美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包庇、纵容及意欲将台湾变成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祸心不退，支持李登辉台独”的批判。老将军最不能容忍的，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他之所以撰文，其直接目的是要表达当时的政治关系、国际背景，当然主要是中美关系、美日关系、两岸关系等，表明他这一代老将军对台湾问题的强硬态度和刚直立场。他在文章中斩钉截铁地说：“对任何胆敢重蹈旧辙的帝国主义分子，坚决给予有来无回的打击！”此话可谓掷地有声。

汪道涵不在军中，他自然不可能象张爱萍那样发表态度如此强硬的文章。虽然，汪道涵的心中是一样的感触，但是，他的身份和位置决定了他必须谨慎得多。

汪道涵坐桌前，稳打“台湾牌”

1998 年，两岸关系问题系于一个焦点上，即“汪辜会

谈”。会谈桌上的两个人将会是名流千古的两个人：汪道涵、辜振甫。

再说张爱萍和叶飞，虽然对“解放台湾”变成“两岸统一”没有什么异议，但心中的那口怨气却是憋了数十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经济建设第一的政策后，两位将军也认可了这种现实。甚至，邓小平希望此事可以拖到下个世纪由子孙们自己解决——当然，首要前提是台湾必须不宣布独立。

很难想象，如果有一天台湾宣布独立了，一切会怎样？我想，真的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采取“非和平”的手段了。

邓小平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人，他看出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所以，上台后立刻搞改革开放，搞经济发展。他曾明确地说：“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现实，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条件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

可见，邓小平比任何人都明白：第一，要让台湾回归，大前提须是大陆的经济发展达到长足进步；第二，实现统一的力量不仅仅指军事上的实力。所以，一句“没有这一点不行”已经说得非常入骨。甚至有些观察家认为，邓小平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即使要诉诸武力了，经济上也要比台湾优越才行。”

1984年邓小平又说：“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拉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的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

从张爱萍、叶飞二人对台湾的强硬态度，可以想见，台湾方面的无理是多么痛地伤及了两位老人的心。我们一再宽容，一再

忍让，可是，李登辉政府就是逆民意而行，逆天意而行！1995年6月，当李登辉访美之后，两位老将军实在忍无可忍，这才著文声讨。

面对这种情绪，这种局面，汪道涵心里十分着急。汪道涵毕竟不是彻底的军人，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从头到尾在部队身经百战打过来的那些人。他是搞行政、搞党务出身的，所以，在思考和处理问题时，他往往不是首先想到军队上的作战风格，而是从政治角度来把握大局。如果说外交事务等于打牌的话，汪道涵觉得，多拿分才是最重要的，呈一时之豪气，纵然可以在自己兵力最强时把对方打个落花流水，其最后结果却往往是失败。当然也不能只看自己一家的牌，而是要顾此顾彼，尽可能让自己得到最多的实惠，哪怕名义上是输家。

世界格局是非常复杂的。对此，我党和我国政府必须审时度势，适时做出调整，以便在维护我国尊严的同时，为我国人民的实际生活争取更大的利益。

台湾问题是与抗日紧密相关的。抗战结束后，罗斯福、邱吉尔等与蒋介石签订了《波茨坦公告》，在这份公告中，日本将台湾还给“中华民国”，所以，在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中，台湾问题成为双层敏感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倒不得不佩服中央决策层任用汪道涵担任海协会会长胆识和眼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许除了汪道涵，真的没有别的更合适的人选。

台湾问题在1995年处于低潮，如何处理下一步两岸关系成为国际外交中的重大议题。因为这直接牵涉到中美、中日甚至日美、日澳等国关系，这是历史决定的复杂现象，现在，有人认为必须宽容，但是，宽容有用吗？特别是没有原则的宽容，所以，在1996年春，在戎马一生的老将军们的建议下，中央决定在台湾海峡实行导弹演习。那一天，我人民解放军衣冠整洁，军容肃

穆。导弹在一线指挥官的指挥下犹如惊雷一个个飞向指定地，台湾海峡已经久违这种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了。这炮声，绝不是为了威胁台湾人民，而是以我军的威力，警告那些台独分子和分裂分子。

引述《波茨坦公告》居心堪疑

时间到了 1998 年的 10 月 18 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表了一篇综述：台媒体认为辜振甫引述《波茨坦公告》反映了台当局的意图。看，到了今天，台湾当局又要花招了。

事情是这样的。国民党政府当然不会愿意放弃他们在台湾的统治权，无奈之下，竟然捧出陈谷子烂芝麻的《波茨坦公告》。在汪辜上海会谈中，台湾海基会会长辜振甫称，两岸分治、互不隶属已近 50 年，他还引述《波茨坦公告》，证明日本战败后已将台湾归还“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5 年 7 月 26 日由蒋介石、邱吉尔及罗斯福在德国波茨坦签订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再次承认《开罗宣言》，指出日本自 1914 年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如东北、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必须全权归还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

据报道，在汪辜会谈之前，李登辉曾在几次接待外宾的场合提及《波茨坦公告》，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所在的台湾地区，是经世界列强承认，由日本归还“中华民国”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还没有成立。台湾当局高层人士指出，李登辉的用意“系在证明中华民国的政权比中共还久，中共政权不但未曾统治

过台湾地区一天，也没有征过一天的税，因此，中共所说‘台湾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说法，于历史及现状都不符”。

台湾《联合报》也认为，“辜振甫在辜汪会晤中援引《波茨坦公告》驳斥海协会的‘一个中国’，这段话绝非神来之笔，而是政府高层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后，认为可以用来破解中共设下的国际迷障，证明台湾所属以及中华民国的存在，也说明李登辉并不是在搞台独”。

针对辜振甫在汪辜首次会晤中援引《波茨坦公告》，台湾《中央日报》、《联合报》及《中国时报》等均有评论。

《中央日报》以《台湾隶属于中华民国》为题发表社论说，“辜先生这番义正辞严的谈话，一方面如实阐述了两岸对等分治的历史事实和政治现实，一方面也清楚揭示了中华民国的主权立场。这个立场，可以说是中共面对两岸关系必须务实认知的客观前提。如果中共只是像过去那样，一味主观假设具体摆在世人面前的中华民国不存在，只会自己误导政策判断，加深台湾人民的反感”；希望“中共能够深入理解辜先生此行亲口传达的‘两岸对等分治历史事实和政治现实’的讯息，正视中华民国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的客观事实，并据此作为一阶段积极增进两岸关系、共谋全中国最终民主和平统一的基础”。

《联合报》的新闻分析认为，“辜振甫此举不论是否是高层授意，但它从历史文献中，找到了台湾与大陆是‘一个中国’的联结”，并认为中共应能从辜的话中体会出“其中善意”。并说，“从法理上言，当台湾已归还中华民国，也是属于整个中国的一部分。内战的结果使得中华民国政府被迫迁台，这是一个政权迁至仍旧属于其领土的一部分，但两岸之间仍是一个中国，大陆是中华民国管辖所不及的部分。就此而言，双方至少还在一个

中国的架构内，北京实在没有理由不高兴。基于这样一个两岸不相统属，却同属一个中国的立场，求同存异，谋求两岸未来的统治，应是可行之道”；认为“辜振甫此行提出这样一个两岸本属同根的概念，而又与汪道涵所提出的‘一个中国’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北京如能以开放心胸视之，自可体会其中善意”。

《中国时报》则持反对意见，认为辜振甫“引述历史文件意义不大”，两岸存在的歧见“不是法律问题，是政治问题”。并说，尽管“单纯从国际法角度而言，中华民国从 1912 年成立以来，虽然统治领土范围曾有增减，现在只及于台、澎、金、马地区，但始终符合一个主权国家应具的条件”，“不过中共自始至终就主张，中华民国确实‘曾经’存在过，但 1949 年后，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及领土，自然也包括二次大战后归还中国的台湾”。分析认为，辜振甫这一段有关《波茨坦公告》的谈话，显示台方一方面极力排拒中共政治性谈判的要求，一方面则希望通过自己的论证来达成符合台湾方面主张的“政治目标”。台湾如果有意打破现实政治形成的国际框架，还是要从政治面着手。如果台湾方面期望以《波茨坦公告》等法律文件来促使中共接受两岸分治状态，给予台湾对等的国际地位，大概只有“自我安慰”的效果。

日本新闻媒介也没有保持现状，他们当然是避而不谈《波茨坦公告》，但对两岸关系却保持强烈的兴趣。日本《朝日新闻》在 10 月 19 日刊登了一篇加腾千洋的评论，题目为《台湾海峡两岸关系能解冻吗》。

文中用了“中台对话”的字样，并综引辜振甫的说法，称辜的此番之行是“隔半个世纪左右再次来到上海和北京”的“融冰之旅”。日本人很明白，所以说，辜的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化解 1996 年春天的中国导弹演习而达到极点的台湾海峡危机，二

是设法探讨旨在缓和国共长期以来僵化的两岸关系。96 年的炮声历历在耳，李登辉当年的愚蠢行为会给他自己留下什么呢？

台湾方面甚至是一直拒绝政治会谈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决定先举行团体会谈，于是诞生了海协会和海基会。1993 年，汪道涵与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次会谈，但由于李登辉的访美，所谓的定期磋商没有继续下去。98 年的上海会谈，难怪辜振甫先生说是“历经半个世纪”了。

台湾方面对大陆方面开展统一攻势保持警惕，表明自己不同意举行政治磋商的立场。但是，当江泽民召见了辜振甫后，辜认为“应该优先就业务问题进行磋商，但也不能回避政治因素。”外电于是认为，中国已经成功地把台湾方面拉到政治对话的桌旁。

无疑，到现在为止，两岸关系总算有了可以进一步对话的可能。但是，从可能到中止，又从中止到继续，这一波折回旋中，汪道涵可谓煞费苦心，功不可没。

台湾这张牌最不好打

1998 年的“汪辜会谈”以及“江辜会谈”决定了汪道涵不久将访问台湾。从正常意义上讲，这种回访既是程序化操作，也是为了进一步交往的可能。但日本《朝日新闻》在评论汪道涵访台时说：“届时，许多问题将得到解决。”一句话，又引起众多猜测：汪道涵到底是什么人？他在中央政治事务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为什么“许多问题”届时可得到解决呢？

在我国的外交事务中，台湾这张牌是最不好打的。正如我国一位学者在一篇外交评述的文章中所讲的：

事实上，两岸的矛盾只在于谁代表合法的、而且是唯一的中国中央政府，不仅中国不同意“一中一台”，蒋介石也一直大骂美国对不住他，搞“一中一台”。在反对搞“两个中国”方面，中国海峡两岸是一致的。还在 1956 年 12 月 9 日，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时有人问台湾问题如果和平解决，中共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职位，周恩来平静而认真地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

早在 1958 年 5 月，也就是炮击金门之前，美国把在台湾的“军事援助顾问团”、“美军协访台湾司令部”等 17 个机构合并为“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看起来，这是为了统一指挥，加强台湾防御，但是蒋介石却不以为然，他知道美国人又在耍花招了。

事实上，毛泽东真的有意图和蒋介石一道去打破美国搞“一中一台”的阴谋。炮击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对他的秘书说：“炮击金门，并不是为了解放台湾，而是蒋介石希望我们打炮，这样他就有了借口，可以抵抗美国的压力。”

历史上的事情，个人看法虽不是决定因素，但也不是全无作用的。后来，经历了中、美解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他的著作《领导者》中这样写道，他发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些中央高级领导人，在谈到蒋介石的时候，“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恨他；作为中国人，他们尊敬甚至还敬佩他。在我同蒋的所有讨论中，他从来没有过相应的尊敬对方的表现。”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肯定是以民族主义为重的，自己暂时打不下台湾，也绝不让美国搞“一中一台”，你蒋介石叫嚷“反攻